

ZHONGGUO CAIZHENG ZHIDU

中国财政制度变迁 与思想演进

(第二卷)

BIANQIAN YU SIXIANG YANJIN

王 军 主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中国财政制度变迁与思想演进

(第二卷)

主 编 王 军
副 主 编 孙文学 欧文汉
本卷主编 齐海鹏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财政制度变迁与思想演进. 第二卷/王军主编.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7-5095-1221-0

I. 中… II. 王… III. 财政制度-经济史-研究-中国 (1840~1949)
IV. F8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11348 号

责任编辑: 赵 力 吕小军

责任校对: 张全录

封面设计: 郁 佳

版式设计: 朱碧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n>

E-mail: cfeph@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142

发行处电话: 88190406 财经书店电话: 64033436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87 × 1092 毫米 16 开 39.75 印张 746 000 字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总定价 (共四册): 380.00 元

ISBN 978-7-5095-1221-0/F.1035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十一章 清后期财政制度变迁与思想演进	(1)
第一节 清后期财政制度与思想演进的政治经济背景	(1)
一、鸦片战争前西方殖民主义的对外扩张和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	(1)
二、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变化	(7)
第二节 清后期财政制度的变革	(16)
一、政府财政支出的变化	(18)
二、税收制度的变革	(36)
三、国债制度的变化	(85)
四、官营企业收入的出现	(94)
五、财政管理制度的演变	(95)
第三节 太平天国时期的财政制度	(111)
一、土地分配制度	(111)
二、赋税制度	(112)
三、特殊收入制度	(116)
四、利益分配制度	(118)
第四节 清后期财政思想的转变	(120)
一、地主阶级改革派的财政思想	(121)
二、太平天国的财政思想	(146)
三、洋务运动时期早期维新派的财政思想	(158)
四、清朝官吏兴办洋务的思想	(188)
五、戊戌变法及新政时期的财政思想	(194)
第五节 小结	(209)
第十二章 北洋政府时期财政制度变迁与思想演进	(212)
第一节 北洋政府时期财政制度与财政思想变革的基础	(213)

一、政治概况·····	(213)
二、经济概况·····	(216)
第二节 北洋政府时期财政制度的变革·····	(221)
一、财政支出的变化·····	(221)
二、税制变革·····	(227)
三、国债的变化·····	(267)
四、财政管理制度的变革·····	(277)
第三节 北洋政府时期财政思想的转变·····	(288)
一、关于财政原则的思想·····	(289)
二、税制整顿和改革思想·····	(292)
三、关于土地税的财政思想·····	(302)
四、裁厘加税观点·····	(309)
五、关税自主运动中的主张·····	(310)
六、盐政和盐税改革的主张·····	(311)
七、直接税思想·····	(315)
八、划分国家税和地方税的思想·····	(321)
九、公债思想·····	(324)
十、控制财政支出的思想·····	(330)
十一、财政管理思想·····	(331)
十二、以经济政策促进财政的思想·····	(332)
第四节 小结·····	(335)
第十三章 国民政府初期财政制度变迁与思想演进·····	(337)
第一节 国民政府初期财政制度变革和思想演变的政治经济背景 ·····	(337)
一、政治概况·····	(337)
二、经济概况·····	(338)
第二节 国民政府初期财政制度的变革·····	(341)
一、财政支出的变化·····	(343)
二、税收制度的变化·····	(352)
三、国债制度的变化·····	(391)
四、财政管理制度的变革·····	(397)
第三节 国民政府初期财政思想的转变·····	(416)

一、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财政政策思想·····	(417)
二、关于土地税收原则与思想·····	(424)
三、废除厘金和改革货物税的思想·····	(428)
四、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关税自主的思想·····	(433)
五、盐政和盐税改革的思想·····	(437)
六、直接税的理论与实践·····	(444)
七、划定和改进地方税的主张·····	(450)
八、公债思想·····	(457)
九、财政管理思想·····	(464)
第四节 小结·····	(473)

第十四章 国民政府抗战时期财政制度变迁与思想演进····· (475)

第一节 国民政府抗战时期财政制度变革与思想演进的政治经济背景·····	(475)
一、政治概况·····	(475)
二、经济概况·····	(477)

第二节 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财政制度变革·····	(485)
一、财政支出的变革·····	(486)
二、税收制度的变革·····	(489)
三、国债制度的变革·····	(518)
四、财政管理制度的变革·····	(524)

第三节 国民政府抗战时期财政思想的变化·····	(532)
一、财政政策思想·····	(532)
二、关于土地税和田赋征实的思想·····	(544)
三、货物税思想·····	(546)
四、关税政策及思想·····	(550)
五、盐税政策主张·····	(550)
六、直接税思想·····	(553)
七、划分财政收支和整理地方财政的主张·····	(561)
八、公债思想·····	(564)
九、财政管理的若干思想·····	(572)

第四节 小结·····	(574)
-------------	---------

第十五章 国民政府崩溃时期的财政制度变迁与思想演进·····	(576)
第一节 国民政府崩溃时期的财政制度变革与思想演进的政治经济背景·····	(576)
一、国民政府“戡乱政治”的破产·····	(576)
二、国民政府经济的崩溃·····	(576)
第二节 国民政府崩溃时期财政制度的变革·····	(577)
一、财政支出的变化·····	(578)
二、税收制度的变化·····	(579)
三、国债制度的变化·····	(592)
四、财政管理制度的变化·····	(594)
五、国民政府财政在恶性通货膨胀中崩溃·····	(598)
第三节 国民政府崩溃时期的财政思想·····	(603)
一、国民政府战后的财政政策思想·····	(604)
二、关于土地税思想·····	(609)
三、关于货物税思想·····	(609)
四、关税政策思想·····	(612)
五、盐税政策主张·····	(613)
六、直接税思想·····	(615)
七、关于整顿地方税的主张·····	(616)
八、战后关于公债的思想·····	(617)
九、税务管理思想·····	(621)
第四节 小结·····	(622)
参考文献·····	(624)

第十一章

清后期财政制度变迁与思想演进

清后期，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12年清帝退位止。这70余年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开始和形成时期。其中，甲午战争前，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开始时期，甲午战争后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形成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的财政制度和财政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第一节 清后期财政制度与思想演进的政治经济背景

一、鸦片战争前西方殖民主义的对外扩张和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

鸦片战争的爆发，既有外因，也有内因。总的来看，鸦片战争是西方殖民主义对外扩张浪潮与中国封建政权实施闭关锁国政策相冲突的结果。明清以来，中国的封建统治已经腐朽不堪，封建的生产关系愈来愈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时中国资本主义因素虽已滋生，但由于封建势力的强大，未能形成足以摧毁封建生产关系的独立的社会力量。与此同时，西方一些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开始用先进的武器和廉价的商品疯狂地对外掠夺，开拓殖民地市场。在中外贸易中，由于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西方殖民主义者难以通过正常贸易捞取好处，便以鸦片走私为武器，攫取私利。这一行为，不仅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和财政，而且严重地毒害了中国人民的肌体。在严峻的形势下，清政府实行禁烟运动。英国殖民主义者以中国政府禁绝毒品、销毁鸦片为由，发动了罪恶的鸦片战争。

（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当中国从明朝后期逐步衰弱之际，正是欧美进入资本主义的新时期。海外

航路的开辟和美洲新大陆的发现，海外商业和重商主义的发展，促使西欧的封建制度进一步瓦解，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在16—17世纪的英国，由于毛纺织业的发展，羊毛价格猛涨，贵族地主以暴力大规模地剥夺农民土地，将耕地改为牧场，出现了“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开始了资本原始积累。1642—1646年（正是明清政权交替之际），英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此后，经过“光荣革命”，最终确立了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

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为工业革命开辟了通途，近代科学和技术在英国得到迅速发展，牛顿、戴维、瓦特等一批著名的科学家在英国大展才华。近代科学体系的建立并深入生产过程，形成近代技术。从18世纪60年代起，飞梭、珍妮纺纱机、水力纺纱机、走锭精纺机、蒸汽机、动力织布机等一连串的发明创造，使纺织工业生产革命性的变化。工业革命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手工工场进化为机器大生产的工厂。纺织业是英国最先发达起来的产业，其产品输出总值，在1780年时还不到36万英镑，而到1802年增加到780万英镑以上，在短短的20多年中增加了20倍以上。棉纺织业的发展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采煤业、钢铁冶炼业、机器制造业、交通运输业、邮电业以及对外贸易和金融业都得到快速发展。强大的工业生产力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随着经济繁荣，国力迅速增强。

美国在18世纪以前还是英国的殖民地，以农业生产为主。英国推行重商主义，对其采取高压强暴政策，加紧搜刮和剥削。1775年4月莱克星顿之战揭开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序幕，经过8年战争，到1783年脱离英国，成立美利坚合众国。美国的产业革命在19世纪初才发生，在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前还够不上是一个工业强国。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受美国独立战争影响，比英国迟了150年，但其激烈程度远远超过英国。几经反复，资产阶级政权在法国站稳脚跟，而与此同时产业革命也在法国展开，法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号工业大国。

产业革命在西方主要国家的先后完成，使资本主义经济进入成熟阶段，结果是“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愈是扩展，资产阶级也愈是发展，愈是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都排挤到后面去”^①。这就是说，世界经济格局的巨变，已经使中国处于落后挨打的地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2页。

（二）西方早期殖民主义对中国沿海的掠夺

在西欧，由于封建社会内部工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14世纪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几个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在欧洲大陆，15世纪时，法兰克福已有150多种不同的手工业行业，巴塞尔有120多种行业，巴黎有350种手工业行业。到16世纪，英国的羊毛除大部分供应佛兰德尔的毛织业外，自己也发展了毛纺织工场手工业，开始有毛布出口。地理大发现为工业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市场，海盗、商人的冒险远航，殖民主义的掠夺和领土占领，为商业与工业提供了巨额货币资本。向海外冒险致富，实现黄金美梦，掀起了殖民主义侵略的狂潮。地大物博的中国成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亚洲的首选目标。

最早来到我国的殖民主义者是葡萄牙人，他们最早在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来华朝贡，并请求通商，还租借澳门为其进行贸易活动的基地，不过直到1848年澳门的主权还属于中国。其后是西班牙海盗商人，他们以菲律宾为根据地，1570年冒用吕宋名义遣使要求与中国通商，未得到允许，则在中国福建漳州、海澄港（厦门）等地走私贸易。继葡、西之后，第三个来中国的是荷兰人，他们以爪哇为殖民据点，曾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万历三十二年及万历三十五年先后到达广州，企图建立通商贸易关系，被葡人所阻，未达目的。1604年用武力占领了我国的澎湖岛，明天启四年（1624年）占领我国台湾岛。荷据台后，即在其东印度公司策划下，强迫我国人民在种植园中种植蔗糖，进行原始性的奴隶劳动和掠夺，并拓土植稻，实行重税。此外，荷兰殖民者还在台湾、爪哇及我国东南沿海掠夺人口，贩卖奴隶，在血腥压榨中获取暴利。所幸1661年郑成功率舰队收复台湾，驱逐荷兰殖民者，台湾回归中国版图，人民得以结束悲惨境遇。

继西、葡、荷兰之后，到中国的是法国、英国和美国。法国商船在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到达广东，载货而归。万历三十七年，法国成立东印度公司，推进东方贸易。清顺治十七年（1716年）法国船只到达广州及澳门六七艘。康熙五十八年法国为加强东方贸易，将已成立的东印度公司、中国公司合并，组成印度公司，在印度、东方各国进行殖民贸易。雍正六年（1728年）在广州设立商馆，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在广州驻法国官员，处理法国商务。法国人同样在中国进行走私贸易，企图进一步侵略。因1789年法国发生大革命，此后又经历拿破仑在欧洲称霸的失败，法国在印度及东方的势力削弱，为英国人所取代。

中英贸易关系开始较葡、西、荷等国为迟，但后来居上。英国在1600年设

立东印度公司，这是英国在海外有势力的冒险商人、公司及东印度贸易者总会联合的垄断公司，经皇家特许，赋予它各种权力，如拥有武装、调动军队、设立法庭、制造货币及处理政治事件等特别权力，是海外贸易及殖民地掠夺的派出机构，作用极大。从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起，到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这240年间，英国对当时还强大的中国开始并未使用武力，而是在通商名义下进行侵略。明崇祯十年（1637年），英王查理一世派使臣约翰·威特尔率商船到达澳门，企图通商，为中国地方官员所拒绝，未达目的，乃强行进入广东省珠江流域，发生冲突，英船毁我虎门炮台，经葡人调停，卸下货物，买回绸缎瓷器等物而去，这是中英发生直接关系的第一次。清承明制，对外实行海禁，仅设广州一埠通市。英商企图在宁波、舟山（定海）开辟贸易，清廷设置重税寓禁于征，英商果然因无利可图，只好遵制在广州一埠贸易。

（三）中国封建政权的闭关锁国政策

明清以来，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为了保护封建经济，消弭足以危害其统治的外来因素，对外实行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这就是用政权的力量限制商品进出口贸易，把对外贸易额降低到最低限度的非自由贸易程度。清承明制，对外仍实行海禁政策。其做法：一是限制通商口岸。清初由于郑成功以台湾为根据地进行反清斗争，清政府有“片板不准下海”的命令。1683年统一台湾后，清政府曾下令开放海禁，准许外商在指定的广州、漳州、宁波、松江等地贸易，置关管理。在这四个口岸中，广州为外国商船集中之地，其他地区只是在特殊情况下，予以临时接待，平时不许在这些地区贸易。而且，在广州也有种种限制。二是保商制度。清政府为限制对外贸易，还在管理上建立一种极为严密的“保商制度”，外商的一切买卖活动必须通过清政府设立的行商来进行。行商通称十三行，是经过清政府批准的、垄断对外贸易的少数特权商人，具有半官半商的性质。行商是一种垄断性的商业组织，凡是外商的一切进口货物由其承销；内地的一切出口货物由其代办。他们独占商务，划一市价，不许竞争，不许经售劣货、拖欠货款。同时，外商应缴的出入口船钞货税，由其承包代缴；外人居住行动，亦由其照料约束；中外交涉事件，由其从中经办。行商一方面垄断中外贸易，一方面又负责外商与清政府之间的联系，实际上负有商业和政治双重任务。清政府将保甲制度的成规推广到行商。行商与行商之间互保，同行倒闭，各行行商负责分摊清偿债务；“行商”保“夷商”，外商生事或拖欠税款，由行商负责连带责任。这就是保商制度。这种制度始于乾隆十年（1745年），此后不断修订、补充。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定的《防范外夷规条》至道光十年（1835年）两广总督卢坤奏准的《管理外夷办法》，

至少经过大小六次的修订，逐步形成一个以监督外商为主要任务的错综复杂的保证系统。按规定：夷商只能同行商交易；夷商交易完毕，不能留在广州过冬；夷商驻留广州期间，行动给予严格限制；外商不准携带武器，不准与内地沟通消息。此外，为了防止“作奸犯科”行为，建立了行商保雇通事、通事保雇买办、买办保雇小工的严密的保证制度。

此外，清政府还限制对外出口商品的种类和数量，如粮食、五金、书籍均严禁出口，丝、茶出口也有一定限制。至于制造军火的原料如硫黄等，绝对禁止出口。

清政府之所以采取闭关的政策，一方面是由于西方商人在中国沿海贸易，常带海盗行为，侵占土地，掠卖人口，进行不等价交换，在各地引起军民抗争，发生事故，层出不穷，清政府不得不采取防范措施。另一方面是中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切可以自给，不需要外来商品，所以，当外商要求开放口岸、自由通商时，总是遭到清政府的断然拒绝。总之，采取闭关政策固有清政府腐败昏庸的原因，实则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海盗行径这一历史原因分不开。

清政府采取的这些办法，对外商自然不便，东印度公司曾大加反对，但未有成效。他们便用贿赂的办法，买通中国官员，大量进行走私，尤其是鸦片走私。

（四）可耻的鸦片走私贸易

18世纪中叶以后，中英贸易已跃居首位。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英国输华商品已占我国入口总值的63.3%，其他欧洲各国共只占36.7%，以后到道光十三年（1833年）为止的各年，虽有升降，但英国一直占到70%—92%，其他各国更不占重要地位。中国输出货物中，1764年输往英国的占46.7%，输往其他各国的占53.3%，以后到1833年止的各年，英国所占比重，一直在41%—79%，其他各国同样不占重要地位^①。

18世纪中叶以后，中英贸易虽迅速发展，但是在正当的商品贸易中，英国皆处于入超状态。那时自中国输出英国及印度的货物超过中国进口货物。中国出产的生丝、茶叶、土布、砂糖、大黄药材、陶瓷器、丝织品等，经东印度公司运出，不仅数量多，而且利润大。这些商品特别适合欧洲市场需要，历久不减。而外商船舶运入中国的货物，如羽纱、呢绒、匹头、钟表细货，只少数有钱人能购买，大多数在广大人民需求之外，销路有限。英国对中国贸易的长期入超，须由本国及印度输出大量白银到中国，借以平衡国际收支。十七八世纪

^① 朱伯康、施正康：《中国经济史》（下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2页。

正是重商主义盛行的时代，对于贸易逆差、白银输出，英国资产阶级总认为失策，千方百计设法纠正，防止金银流出，挽回贸易逆差。东印度公司既不愿停止高利的茶叶、生丝等贸易，又不愿意支付白银，于是就从印度向中国输出棉花，以求抵偿，减少贸易逆差。从1760—1833年的70多年中，中英贸易额增长很快，其中进口贸易增加了15倍，出口贸易额增加了9倍多，进口比出口增长得快，但是在正当贸易的绝对数字上中国一直处于出超地位。直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仍然每年出超200万—300万两以上。正当商品贸易的方式无法改变英国处于贸易逆差的状态。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东印度公司发现鸦片贸易利润极大，是一项弥补贸易差额的有利商品，出于极端自私的卑鄙目的，开始向中国输出鸦片。

鸦片在明代称作阿芙蓉，用得过量有害身体，但适量却有医药价值。早期鸦片是作为药材输入的。乾隆以前，海关则例将鸦片列入药材项下，每百斤税银三两，又分头银二两四钱五分。鸦片入关纳税后，交付洋行（行商）兑换茶叶等货。数量有限，每年输入不超过200箱。最早输入鸦片的是葡萄牙商人及荷兰商人，后来才有英国商人参加。到1757年英国占领了印度鸦片产地孟加拉后，英国商人就开始大规模地贩卖鸦片。此后，鸦片输华每年增加，但“以功令森严，不敢公然贸易，比用银私售”^①。1773年英属印度政府给予东印度公司以独占鸦片专卖权后，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迅速增加。大致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至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中国每年输入约4000—5000箱，以后逐年增加，道光十八年（1838年）竟达4万余箱。道光七年（1827年）以后，由于鸦片走私的急剧增加，英国不再流出白银，相反，中国白银开始外流，流出的数量一年比一年多，自100万—400万两以上。

鸦片走私给东印度公司、英属印度政府和鸦片贩子带来了暴利。英印政府用贷款鼓励农民种植，低价垄断收购，然后由官吏卖给东印度公司，运到中国，利润极高，每箱鸦片（每箱重133磅，国人通称重百斤）在产地约250印洋，运至加尔各答以每箱1210—1600印洋出售。当时英属印度政府以3%的税率收税，财政收入约有七分之一来自鸦片。鸦片贩子也从中赚得厚利，因为在中国鸦片交易是私下进行的，既不需要纳税，又是现金交易，销货手续费是3%，盈利手续费是1%，概不拖欠，每箱可赚20英镑，年年如此。

鸦片的输入却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众所周知，鸦片是一种毒品，吸食过量对身体有害。当鸦片烟毒泛滥于全国之时，首当其冲的危害就是严重摧残了中国人民的肌体和精神，造成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的严重萎缩。与之相伴

^① 《鸦片战争》第一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64年版，第449页。

随的则是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贫困、偷盗、卖淫等日益严重，社会遑遑不安。其次，鸦片泛滥给中国国民经济带来严重不利的影响。由于人们把金钱大量地用在吸食鸦片上，造成社会购买力日益减退，打击了工商业的发展。由于白银大量外流，造成银贵钱贱的危机，由此带来一系列的经济问题。农民和手工业者在银贵钱贱的危机中，无形中增加了税收负担。清朝民间主要流行制钱，按规定，每两白银换钱1000文，由于银荒，结果到19世纪20年代，每两白银换钱1200余文，到1839年则换1600余文。由于农民和手工业者出卖产品所得的都是制钱，而清政府规定交纳的各种赋税却必须折成白银，这样一来上缴赋税实际上增加60%，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与此同时，由于白银大量外流，财政收入日益枯竭，官俸和兵饷大感支绌，这使得清政府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不得不下决心采取措施解决鸦片问题。

道光十九年正月（1839年），清廷下令吸食与贩卖鸦片一律禁止，并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州查办禁烟。中国的禁烟运动触犯了英国商人的利益，英国政府为了保护鸦片贸易，公然发动武装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

二、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变化

鸦片战争中，清朝的军队在英国的坚船利炮面前，投降妥协，最终导致失败。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清政府被迫在英国的炮舰上签订了《中英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除割地赔款，清政府还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通商口岸，实行协定关税并取消公行制度。以此为开端，在英、美、法等殖民主义列强所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打击下，腐朽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从而破坏了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使中国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1894年甲午战争以前，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处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其侵略目的以经济利益为主，侵略方式主要是商品输出；同时，由于清政府具有一定的反抗侵略的思想和能力，所以这一时期中国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阶段。

甲午战争以后，情形则大不相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由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走向帝国主义阶段，加紧了瓜分世界的脚步。中国当然是瓜分的重要目标之一。由于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瓜分中国的目标难以实现，便开始以军事侵略为手段，通过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以攫取政治的和经济的特权，并通过资本输出以控制中国的经济，中日甲午战争则是这一目的的开端。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获取了开设工厂、矿山和建筑铁路的特权，获取了“租借地”，并划定了“势力范围”，中国的主权被大肆攫夺。帝国主义列强利用取得

特权和条件，加紧了对华的经济侵略。一方面，直接来华投资于工矿、铁路和商业的外资规模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向清政府提供借款的规模不断膨胀。据统计，从1895年至清朝灭亡前夕，帝国主义列强向清政府提供的借款达12亿两库平银。这些借款是以中国的关税、盐税以及后来的内地税作抵押的，帝国主义列强以此控制了清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当然，也必须看到，帝国主义国家在向中国输出资本的同时，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传入中国，为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这一时期，中国不仅官僚资本主义工商业有所发展，而且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了发展的机会，工厂设立逐年增多，金融业也应运而生并有所发展。与此同时，农业经济因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深化而发生变化，一方面是土地兼并问题日益严重；另一方面，农产品商品化的脚步不断加快。然而，在依赖于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国际市场上，中国农产品的价格发生着剧烈地波动，而受价格变化的影响，中国农民的经济、政治地位每况愈下，生活状况更加悲惨。正如马克思所说：“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结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所有这些破坏性因素，都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气、工业和政治结构。”^①

（一）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期间中国社会经济

1. 中国变成了殖民主义列强合法的产品销售市场和掠夺原料的基地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同英国签订了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次年英政府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江宁条约》的两个附约，即《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亦称《虎门条约》）。嗣后，美国政府迫使清政府签订《中美望厦条约》，法国政府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其他资本主义各国，如葡萄牙、比利时、瑞典、荷兰、西班牙等，也纷纷迫使清政府与其签约。这些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丧失了关税主权、司法主权、领土主权，同时使中国由一口通商口岸扩展成五口通商口岸。自此一向闭关自守的大清帝国门户洞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在中国可以公开合法地进行商品贸易。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英、美、法、俄再次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这些条约使中国进一步丧失了海关行政权、沿海贸易权、内河航行权与内地通商权，并且使外国获得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原来的五

^①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11页。

口通商口岸进一步扩展为 14 个商埠,而且还要在中国享受片面最惠国待遇。进而殖民主义列强又凭借他们在中国攫取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特权对中国进行肆无忌惮的经济侵略,即大肆地倾销商品,把中国变成了他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和掠夺原料的基地。据统计,1894 年洋货进口净值达 162.102 千海关两,比 1864 年增长近 3 倍^①。在进口货物中,鸦片一直占有重要地位,1842 年在输入中国的物品总值中,鸦片占 55.2%;棉花占 20%;棉制品仅占 8.4%。到 1885 年棉制品才升为第一位,占 35.7%,鸦片仍占 28.8%。在进口的棉制品中,棉纱增长的速度又大大超过棉布。1872 年棉纱进口量达 5 万担,到 1890 年增为 108.2 万担,是 1872 年的 2164%。1872 年棉布进口量为 1224.1 万匹,1888 年达到 1866.4 万匹,为 1872 年的 152.2%。1890 年略有下降,仍为 1556.1 万匹,为 1872 年的 127.1%^②。在大宗的进口货物中还有煤油、糖类、粮食、铁、钢和其他装饰品、奢侈品。

在出口货物中,出口的物资主要是农产品,其中大宗的是丝和茶,此外,还有棉花、豆类和糖等。丝茶出口值在 19 世纪下半期占出口总值的 50%—90%^③。但由于印度、锡兰和日本参与竞争,所以这两项物资虽然出口绝对值不断增加,但比重却还逐年下降。而棉花和豆类出口的增长却很快,1871—1873 年输出的棉花为 8486 公担,豆类为 57506 公担^④。这种增长不是因为中国出口能力提高引起的,而是由于殖民主义列强工业发展的需要引起的,是他们对中国进行原料掠夺和农产品掠夺的直接后果。

除对中国进行商品输出、掠夺原材料之外,殖民主义列强还对中国进行初期的资本输出,如在中国建立银行,独霸中国的银行业,控制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操纵金融,为其商品输出服务;在中国开办交通运输业,垄断中国的远洋和内河的航运;在中国开办各种工业企业,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料,就近销售于中国市场,成为压迫和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强大势力。

2. 中国手工业和农业受到严重冲击而日趋没落

通商口岸的开放,使殖民主义列强的经济势力乘机侵入中国,他们通过商品输出毒害中国人民,掠夺中国的财富,同时,使洋货深入到中国的穷乡僻壤,严重打击了中国的工农业经济,致使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工农业生产濒临破产。

受到洋货冲击的首先是中国手工棉纺织工业。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还是

① 杨端六、侯厚培等:《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 1931 年版,表 1。

②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8—9 页、58 页。

③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76 页。

④ 同注③,第 74—75 页。

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鸦片战争后，特别是自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纱、洋布大量涌入中国，由于洋纱洋布价格低廉，土纱、土布无法与之竞争，所以洋纱首先代替了土纱，继之洋布代替了土布。随之冶铁、铁器制造、榨油、制糖、蚕丝、制茶等其他手工业也受到洋货冲击。自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铁及铁制品大量输入中国，到1891年已达1726056担^①，虽然其质量不如土铁，但价格低廉，结果土铁渐为洋铁所替代，铁制品如铁线、五金货物等亦然。煤油入口量急剧增加，从而排挤了中国的榨油业。洋糖、进口火柴、肥皂都相继取代了国货，蚕丝、制茶业也因受到国外市场的排挤而生产萎缩。由于洋货逐渐代替土货，致使中国手工业日趋破产。许多手工业工人因此失去生计。

受到严重冲击的还有中国的农村经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仍然保存了下来，这是殖民主义列强多方扶植和支持的结果。并成为他们侵略、统治中国的支柱。他们不仅支持中国的封建地主、官僚买办兼并土地，而且他们自己也乘机在中国大肆兼并侵占土地，致使大量农民破产失业。同时由于商品倾销和掠夺原材料，中国的农产品日益商品化，并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的需求而兴衰。例如茶、甘蔗、兰靛等就受资本主义市场的竞争影响而日趋衰落，而桑蚕、棉花、烟草、小豆、花生、桐油等却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的需要而不断扩展。这种现象说明，中国农业经济也正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化。

3. 资本主义经济势力侵入中国，使中国的财政金融受到严重破坏

殖民主义者的入侵，不仅腐蚀了中国的政治机体，破坏了中国的社会经济，而且由于白银外流，银贵钱贱，也导致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和金融紊乱。白银外流问题，远在18世纪已经成为中国财政金融的突出矛盾，因此，嘉庆年间曾多次申禁银两出口。19世纪初叶，白银外流现象更为严重。据黄爵滋的估算，仅广州一地“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1834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即道光十八年，1839年），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此外，福建、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余万两。”^②由于白银外流，致使银荒奇重，导致银贵钱贱。每两白银，19世纪初可兑换制钱1000文，至1832年已上涨到1350文，到1838年更上涨到1600多文^③。

①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64页。

② 杨松：《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34—35页。按这一估算可能有些夸张，但有人估计从道光元年以后到道光二十年，走漏白银至少也在1亿元以上，占当时银货流通总额的五分之一，相当于一年的财政收入。

③ 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29页。